

>>评论员观察

软硬兼施编织渔民“安全网”

在风涛云涌的海上,政府有责任保护本国渔民的合法权益。中国渔民的海上安全最终离不开稳定的周边环境,所谓上兵伐谋,构建什么样的周边战略至关重要,宣示国力倒在其次。

□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

本月,中国渔民似乎进入了多事之秋。继一名中国台湾渔民被菲律宾海警枪击身亡之后,又爆出了其他周边国家接连扣留中国渔民的消息。如何保障中国渔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,自然成了中国处理周边外交时需谨慎考虑的问题。

其实,中国渔民海上作业的安全问题,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凸显并且在数量上呈

现上升趋势。其中不排除有渔民违规越界作业的问题,但周边关系中的纠纷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渔民的正常作业。在风涛云涌的海上,渔民误闯他国海域或者对方对海上边界有异议都很难完全避免,但无论出现什么情况,政府都有责任保护本国渔民的合法权益。

面对个别不断制造摩擦的周边国家,保护中国渔民的作业安全,强大的国家实力是最坚实的后盾。伴随着

和平崛起的进程,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都与日俱增。对那些不能与邻为善的国家来说,强大的中国有着强大的威慑力。一些国家曾经以种种借口扣留过中国渔民,但是经过外交斡旋之后还是予以释放,背后自然有国家实力的博弈。今天,中国渔民海上作业的范围越来越大,利益与风险也是并存的,这不仅需要政府及时提供安全信息,引导渔民规避风险,更需要政府进行

协调和谈判,及时解决渔业纠纷。实力强大的政府在谈判中无疑拥有更多的外交筹码,也更能有效保护本国公民。

面对频繁发生的渔民被扣被枪击事件,国内有些人希望政府在对外交涉时有更强硬的态度。这种心情可以理解,但是也应当看到,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态度和要

求,在策略上也当有所区分。中国在近代史上曾经饱受强权欺凌,己所不欲勿施于人,即便我们的国力足够强大,也应避免以强权手段解决周边纠纷。我们优先选择的应该是依法解决纠纷。去年震惊世界的“湄公河惨案”发生之后,中国警方就通过多国联合侦查执法的方式抓到了凶手,并依据国际法将他们引渡到中国。在国际渔业纠纷中,政府不必一味“护短”,但可以及时为渔民提供法律援助,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。我们必须明确反对的是一些国家的暴力执法甚至绑架式

执法,那些枪击或殴打中国渔民的,尤其应该受到严厉谴责。

导致中国渔民作业环境不安全的因素有很多,不同的事件往往有不同的起因。总的来看,这些事件反映了中国目前的周边安全环境仍然潜在着一些威胁。中国渔民的海上安全最终离不开稳定的周边环境,所谓上兵伐谋,构建什么样的周边战略至关重要,宣示国力倒在其次。

纠正错案不能止于赔偿金

无论是赔偿金还是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,都只是对个别错案的纠正,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,解决刑诉制度上存在的问题,才能真正“防患于未然”。

□本报评论员 姜士强

20日,浙江法院网贴出一则消息,浙江省高院对张辉、张高平再审判改判无罪做出国家赔偿,支付张氏叔侄二人国家赔偿金共计220多万元。有记者联系上了两位受害人,张高平表示不会去拿那笔钱,张辉也称,要等与律师沟通后再说。看来,两位受害人在乎的并不是赔偿金,

在叔侄两人从好心人“变成”杀人犯的过程中,侦

查、预审、公诉、审判等环节,都没能阻止错案的发生,浙江高院的二审判决只是临门一脚。时至今日,参与案件的其他机构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,相关办案人员又应当接受什么惩处,都还没有定论。叔侄每人获得的100多万赔偿金,只是一部分迟来的正义,看似圆满的结局背后,纠正错案的道路远没有结束。

赔偿总是发生在伤害之后,国家赔偿金制度也属于事后纠偏,冤假错案给当事

人带来的创伤,并不是金钱能够弥补的。自2003年5月23日被刑拘,到2013年3月26日经再审判改判无罪释放,张氏叔侄共被限制人身自由3596天。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,他们还饱受刑讯逼供带来的精神和肉体伤害。在这样的遭遇面前,金钱显得无足轻重。赔偿金制度,更多的是一种补救措施,是给那些合法权益受到公权力侵犯的公民或组织一些物质上的安慰。如果单靠赔偿就能了事,

法律的尊严、权力的威信就变成了一场金钱与自由的交易。

在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,参与办案的人是关键因素,他们是公权力的使用者,一旦有错案发生,追责是比赔偿更重要的。赔偿金是由国家支付的,是动用全民的力量抚慰受害者,相对而言,那些滥用公权力的人,那些直接造成错案的人,更应当得到法律法规的严惩。只有这样,才能让公权力的使用

者有所忌惮,在办案时不敢妄为。早在3月28日,浙江省公安厅官方网站就刊登了一条针对张氏叔侄错案的简讯,表示会“做到有错必纠,有责必查,绝不掩盖,绝不袒护”。时至今日,该案的预审员,所谓的“女神探”聂海芬,还在岗位上正常工作;侦办此案的其他工作人员,也没有传出受到追究的消息。

在张氏叔侄错案中,真正的元凶是刑讯逼供,此前发生的赵作海案等,也是相

似的原因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就曾表示,我国的刑诉法还存在不足,“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措施和保障性的条款还是不够。”另外,聂海芬饱受争议,则来自于案件中预审程序的失守,“侦审合一”同样受到质疑。人们对张氏叔侄错案的关注,更多的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安全,如果这些法律漏洞得不到弥补,再多的赔偿金也无济于事。

>>公民论坛

“旅游愿望不强”根源是无闲无钱

□叶祝颐

5月19日,国家旅游局首次发布《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》。报告显示,中国国民工作日空闲时间仅3小时,占全天的13.15%,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18个国家23.9%的平均值。调查称,带薪休假方面,中国大陆在参与调查的3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低。从主观上来看,中国国民旅游休闲的愿望还不够强

烈。(5月20日中国新闻网)

在今年2月,国务院办公厅已印发《国民旅游休闲纲要》,这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旅游休闲需求,促进旅游休闲产业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。但令人遗憾的是,国民旅游休闲计划推而不动,大家的旅游休闲愿望往往给生活压力让位。

要让群众旅游休闲的愿望强烈起来,关键是要有时间 and 费用的保障。一是大家有闲暇时间去享受旅游休

闲,而不是“被加班”、“被全勤”。二是旅游休闲产品放下高贵身段,走向平民化,让普通公众具备旅游休闲消费的经济承受能力。

为此,政府部门应提高执行力,用制度保证带薪年假成为现实;景区也应回归公益本质与公共属性定位,下调门票价格,这不仅会激发公众的旅游休闲热情,而且会对拉动内需、刺激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。如此,才能收到多赢的局面。

打破“铁饭碗”应完善考核机制

□邓子庆

据报道,今年江苏将选择部分地区试点公务员聘任制。此外,福建首批聘任制公务员将陆续在漳州、厦门上岗;广西也拿出高层职位聘任制公务员。公务员聘任制正成一股“潮流”。(5月20日《京华时报》)

立像企业那样能进能出、能上能下的公务员聘用制,是现代公共行政组织发展的大方向。但是,改革能否成功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细节设计的把握。目前,很多地方对聘任制公务员的考核规定仍过于粗放,离打破“铁饭碗”还有距离。

应该看到,现行公务员

法对委任制公务员也设有考核及退出机制,但是除退休外,其他的退出方式极少被应用。目前,对聘任制公务员的辞退,许多地方是照搬了委任制公务员的做法,没有进行专门的制度设计。在此情况下,聘任制公务员的“退出”渠道并没有扩大,实现“能进能出”不是那么乐观。

实名制购票需人性化配套

□苑广阔

5月18日,从广西柳州到武汉的林先生在武昌站出站时发现了,自己实名购买的车票不见了。工作人员要求林先生全价补票并加收50%的费用才能放其出站,双方各执一词,相持不下,最后各退一步,林先生全价补票,铁路部门则免收了票价50%的

“罚款”。(5月20日《武汉晚报》)

在这起纠纷中,双方都有道理:乘客认为自己是实名制购票,虽然票丢失了,但铁路系统的电脑里肯定有购票记录,能够证明自己是购票上车;铁路部门要求旅客补票并罚款,确实是照章办事,并非故意刁难。出现矛盾,说到底,是因为旅客在购

票上已经“前进”一步,但铁路部门遵守的规章制度却没有做相应的改进。

铁路系统实名制购票,意义重大,值得肯定,但是在一些细节和配套措施上,也应该与时俱进,坚持人性化原则,尽量减少对旅客带来的困扰和不便才是。那种旧规难以适应新形势的情况,应该改改了。



西评

“戴罪立功”

在河南洛宁县,一名房屋管理所所长几年前因违规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,被法院判犯有滥用职权罪,免于刑事处罚。让人不解的是,在所长职务被免之后,这名已经被法院判罪的人员仍担任县住建局副局长至今。(新华网郑州5月20日电)

漫画/李宏宇

>>媒体视点

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

中国的发展一直保持良好势头,这是基本面。然而,对中国经济形势,我们也有一个基本判断,那就是,过去2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、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时代,已经去而不返,这是经济规律使然。最近几年,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下行,加上外部的需求萎缩,财政面临较大压力,虽然通过转方式、调结构,未来会有好转,但财政偏紧的状况将成常态。经济再发展,也不能大

手大脚奢侈享受。目前,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,逐步接近一些中等发达国家,控制好这一比例,已势在必行。钱袋子小了,更要精打细算,取之有度,用之有节,方能细水长流、遇事不愁。何况在有限的财政中,我们还有那么多民生工程要做。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)

别让“涉密”成为信息不公开的托词

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核心,是在重大发展决策中,保障公众在环境利益上的知情权、参与权与决策权。而公众参与项目决策可供参考的信息的重要来源,就是环境影响评价报告。

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可能涉密,与信息不公开、公众参与等并不相背,回避秘密部分或作技术处理即可,拒绝公开只不过是托辞而已。如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金涌所说,某类化工项目在中国已成为敏感符号,其解决之道还在于政府、企业和群众的沟通,项目信息公开透明,政府引导市民广泛参与企业项目的立项、评估和生产建设,“没有神秘了,它自然不会恐怖”。用“秘密”做托辞,永远也不能平复公众内心的恐惧。(摘自《东方早报》,作者赵绘宇)

■本版投稿邮箱:
qilupinglun@sina.com